

· 哲学专题讨论 ·

作为实践哲学的解释学

——论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

邵 华

摘 要: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思想和实践哲学具有密切的联系。他受古代实践哲学传统的影响,强调实践哲学和实践的互动关系,这决定了实践哲学不同于理论哲学和制作哲学的特点。这种关系启发了他对解释学特征的看法,以“参与”理想取代科学的客观性理想。他力图将实践哲学和解释学融合起来,形成解释学的实践哲学。这种实践哲学立足于当代历史处境,反思不同于科学技术理性的实践合理性,批判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统治给人类造成的危机。他的解释学的对话理想对于当代实践问题,如不同文明如何共存,如何对待与传统的关系等,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实践;实践合理性;解释学;对话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047(2021)01-0003-19

解释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在一般的意义上,它是关于理解和解释的理论,在历史上具有不同的形态。传统的解释学被认为是关于文本的解释和阐释的技艺,与语法学、修辞学、辩证法等有着密切联系,其应用领域主要包括对圣经、古典文学、法律的解释。19世纪以来解释学逐渐普遍化、哲学化,施莱尔马赫提出普遍解释学,狄尔泰将解释学作为精神科学方法论,到了20世纪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从存在论高度发展出哲学解释学或解释学哲学。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中我们发现他非常关注意解释学和实践哲学的关系。他的哲学解释学思想的形成受到了早年实践

作者简介:邵华,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编号:2020WKYXQN023)。

哲学研究的影响,而他在晚年又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具有解释学色彩的实践哲学,明确提出了“解释学是哲学,而且作为哲学是实践哲学”^①。伽达默尔所说的实践哲学是指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实践哲学传统,这一传统随着18世纪以来诸多现代伦理政治理论的兴起而逐渐式微。伽达默尔可被看作20世纪复兴古典实践哲学传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于实践哲学理论的性质、特点、作用,以及与解释学的关系等问题有许多精辟的见解。

一、实践哲学的理论特性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六卷中曾将一切科学(episteme)分为三个部分:理论的、实践的和制作的。在古代,“科学”一词的含义较宽泛,泛指运用论证而成为学说的知识。理论科学研究永恒不变的原因,包括物理学、数学和神学(第一哲学)。实践科学研究变动不居的人事,包括伦理学和政治学。制作科学是与技艺有关的实用性科学。亚里士多德对三类科学知识的划分被后人视为区分了三种哲学。在亚里士多德之前,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哲学家已经有不少关于伦理政治问题的讨论,但这种讨论是和其他知识的讨论混杂在一起的,而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学科体系,首次将实践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提出来,就此而言,他是实践哲学的创立者。

伽达默尔对实践哲学和实践的看法受到亚里士多德的深刻影响,基本上可以说是对他的现代诠释。在伽达默尔看来,实践表达了最广泛意义上生物的行为模式,是生物之生命的实现。实践一方面体现了生命的能动性,另一方面又受到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制约,具有处境性特点。每种生物都有特定的实践和生活方式,但人和动物又有着根本的区别,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人具有自由选择(prohairesis)的特征。因此人的生活方式不像其他生物一样被自然所固定,人的实践活动也不是受内在本能支配的纯粹自然的行为模式。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由选择就是在诸多事物中选取好的东西,只有拥有理性的动物才有自由选择。“自由选择这个名词就包含了逻各斯和思想,它的意思就是先于别的而选取某一事物。”^②自由选择是人独有的特性,它意味着人能有意识地区分善恶,选取善的东西而避开恶的东西。亚里士

① Hans-George Gadamer, *Reason in the Age of Science*, Frederick G. Lawrence (tran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81, p. 111.

②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7页。译文有改动。

多德的“自由选择”概念是褒义的，特指合乎理性的、好的选择，因而这种选择与实践中的理智德性——实践智慧（*phronesis*）相关。据此，伽达默尔认为：“实践的真正基础构成人的核心和本质特征，亦即人并非受本能驱使，而是有理性地过自己的生活。从人的本质中得出的基本美德就是引导他‘实践’的合理性（*Vernünftigkeit*）。对此希腊语的表述是 *Phronesis*（实践智慧）。”^①

在伽达默尔看来，古代并没有理论（*theoria*）和实践（*praxis*）的对立，理论作为生命的沉思活动甚至被作为最高贵的实践。与实践相对立的毋宁说是制作活动。制作是奴隶或平民从事的物质生产工作，它为城邦生活提供了经济基础。但希腊思想家（包括亚里士多德）贬低这种活动。物质生产是为了满足人的物质需要而不得不从事的活动，并非一种自由的、配得上人的尊严的活动方式。实践则是人的自我实现的活动，属于自由的生活，它意味着从生存需要中解放出来。真正的自由人是摆脱了物质需要之强制的公民，他们能在生产活动之外从事与伦理政治有关的事务，并在其中追求美德，实现良善的生活，少数人还能从事哲学思考。无论从事伦理政治实践还是进行哲学理论思考，都属于自由的活动，奴隶是被排除在外的，因而亚里士多德在实践哲学中将实践概念应用于城邦的自由民阶层。实践哲学并不涉及可学的专家技能和技术，“它只涉及每一个体作为公民所应有的东西，以及构成他的德性或卓越的东西。因此实践哲学需要将人类具有自由选择特征提升到反思意识层面上”^②。

人的技能技术仅限于某些特定领域，只是为了人类生活某一方面的善，如医术为了健康，建筑术为了居住，而人们在实践活动中追求的善则关系到生活整体，一个有实践智慧的人应是善于考虑对个人或国家总体上好或有益的人。因此，实践哲学不像技术那样仅限于某些特定领域，而是要和生活中包容一切的善的问题打交道，如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什么是好的国家制度。另一个方面，实践哲学所关涉的善是属人的、实践的善，而不是本体论或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善。亚里士多德正是通过对柏拉图善的理念的批判而建立起实践哲学，实践哲学有其自身的立足点，而不是作为理论哲学的特殊样式。实践哲学这个术语也表明它不打算对实践问题进

① 《伽达默尔全集》（第2卷），第324页。本文所引《伽达默尔全集》为十卷本 Hans-Georg Gadamer, *Gesammelte Werke*, Tübinge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其中第1、2卷的译文据洪汉鼎先生的中译本（《诠释学 I: 真理与方法》和《诠释学 II: 真理与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个别地方根据德文版修改，页码指德文版页码，可根据中文版页码查找。下引《伽达默尔全集》简写为 GW，并注明卷号和页码。

② Hans-George Gadamer, *Reason in the Age of Science*, p. 92.

行某种宇宙论、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论证。可见实践哲学的科学特性依赖于特殊条件,具有一种特别的合法性。

虽然亚里士多德相对于理论哲学而提出了独立的实践哲学,但他对于实践哲学的理论特征的认识是模糊的。他是根据对象领域而非科学方法特性的区别来划分各门学科的,各门学科的特点要依对象而定。实践哲学的对象即实践活动本身就含有实践认知,然而实践哲学又不同于具体的实践知识,它作为科学是关于普遍的东西的知识,比如具有规则性的各种行为模式,而且是可以教授的。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提出实践哲学不仅要认识善,也要有助于善。伽达默尔也认为“实践哲学的这种反思必须仍然根据内在必然性提出要求:不仅要认识什么是善,而且要有助于善”^①。就此而言,实践哲学不同于理论哲学,而是和制作哲学相近,它们都以实际应用为导向的,而不是满足于纯粹的认知。实践哲学的普遍知识能够成为知识仅仅在于能够运用于具体处境中。然而,并没有预先给予的普遍知识可以以不变的形式应用到每种情况,因为实践依赖于具体处境,实践者要回应具体处境的要求。当我们选择某物时,我们要凭借自己的知识说明选择的理由,指出选择与善的联系。这种指导我们行为的实践知识是具体处境所要求的,它并不像可习得的技术让我们免于考虑和决定的责任。也正因为如此,定位于实践知识的实践哲学既不同于理论哲学,也不同于专家技能,而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科学。伽达默尔认为,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明确区分现实活动中的实践知识与研究它的实践哲学,“显然在他看来不言而喻的是,在这些领域中普遍的知识根本不会提出任何独立的要求,而总是包含有转用到个别情况的具体运用”^②。也就是说,实践哲学所阐述的普遍知识并不具有独立性,而总是要应用到具体处境中,转化为具体的实践认知。实践哲学并不能取代具体环境中个体的合理性的决定,也并不比后者更优越。

因此,实践哲学的应用和技术知识的应用是不同的,它需要人自由选择并承担责任。此外,技术要完成什么任务是由外部权威规定的,它本身并不对目的进行反思。而实践哲学要反思目的本身,认识什么是我们要追求的善。实践哲学对我们的生活的指导不是技术性的,而是范导性的。它通过从哲学高度反思什么是好的生活,如何追求好的生活,生活的目的和规范是什么,引导我们追求、实现良善的生

① GW, Bd. 7, S. 386.

② GW, Bd. 2, S. 303.

活。这就不同于一般的教授为人处世的生活技艺之学。亚里士多德曾把伦理学的作用比作射箭时用的瞄准器，它虽然不保证你能射中目标，但至少能帮助你射中目标。“亚里士多德充分地意识到，实践哲学只能追随对知识和自我理解的冲动——这种冲动总是已经活动于人的行为和决定中——并且把模糊的直觉提升到更大的清晰性中，如同通过瞄准一个目标（《尼各马可伦理学》A1, 1093a23f.），或者通过对某个已知目标的更精确的分析（《优台谟伦理学》A2, 1214B11）帮助射手射击。”^①伽达默尔还认为：“伦理学并非只描述有效的规范，而且也证明这些规范的效用，甚或制定更为正确的规范。”^②马太·法斯特（Matthew Foster）指出，伽达默尔对实践哲学的刻画将实践哲学规定为有关实践的描述性的普遍东西的表达，以及对于实践的规定性的普遍东西的表达，这种表达总是植根于实践应用的经验中。^③可见，伽达默尔并不赞同当代伦理学中的反理论主义的态度。虽然人们在一般的生活中就能培养实践智慧，具有朴素的道德知识，并能够进行道德选择，但实践哲学自有其作用和意义。它通过对日常实践知识的反思、提炼、系统化，形成可以传授的普遍知识。对实践哲学的学习有助于澄清我们的实践规范和善的目标，从而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实践哲学虽然不是实践智慧，但有助于实践智慧的培养和实行。

实践哲学“必须来自实践本身，并且用一切带向清楚意识的典型概括，回到实践中去”^④。它要求学习者和教授者都保持和实践的密切联系，因而实践哲学有其前提和条件，这就造成了它的科学性的疑难。伽达默尔说：“对于人类生活实践领域的整个理论求知欲问题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东西在于：在一切理论说明之前，我们已经预先假定了一切人先行献身于某种具有确定内容的合理性理想。一种带有内容前提的科学！我认为这里产生出实践哲学置身其中的真正科学理论疑难。”^⑤实践哲学要求学习者和研究者已经生活在社会生活中，受到社会规范的规定。当然这些社会规范也会受到批判和改变，然而我们不可能抽象地推导出规范观念，以科学的正确性来建立其有效性。他和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一样，认为人类生活中就已经有了合理性的规范，并不需要理论家另外去创立一套规范体系，进而要求改造社会，让人们服从抽象的理论。理论家需要的只是通过对道德现象的概略性解释去澄

① GW, Bd. 7, S. 387.

② GW, Bd. 2, S. 304.

③ Matthew Foster, *Gadamer and Practical Philosophy: The Hermeneutics of Moral Confidence*, Atlanta, Georgia: Scholars Press, p. 187.

④ Hans-George Gadamer, *Reason in the Age of Science*, p. 92.

⑤ GW, Bd. 2, S. 326.

清我们的道德意识,在这个过程中也包含着对现实的批判。因此伽达默尔反对以一种科学的客观性来建立实践哲学,实践哲学要求的科学概念有其特殊性,“这里要求的是这样一种科学概念,这种概念不承认不相干(不参与)的旁观者的理想,而是力图以联系一切人的共同性意识取代这种理想”^①。

实践哲学不像理论哲学或现代科学那样要求研究者超越现实生活,达到旁观者的不偏不倚的立场,追求知识客观性,而是以学习者、研究者参与社会生活、具有社会的合理性理想为前提;而且,实践哲学本身要介入现实生活,有助于人类实现良善生活,因而具有价值倾向性。因此,实践哲学必须立足于人的有限的历史存在。实践的领域不是永恒的、必然性的领域,而是变化的、或然性的领域。实践哲学并不追求科学的客观性和确定性,而且能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实践哲学不同于传统理论哲学那样要求无限理智,而是要根据人类有限的生活经验,“实践哲学的范式必须取代理论(Theoria)的地位,这种‘理论’的本体论证明唯有在‘无限理智’(intellectus infinitus)中才能找到,而我们的与启示无关的此在经验则对此一无所知”^②。

二、解释学与实践哲学的关系

实践哲学和实践的关系对于我们认识解释学的理论特征也有启发意义。早期解释学不是纯粹理论教科书,而是一种实践指南,属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技艺之学,它具有直接的实用的目的,即帮助人们理解不好懂的文本。然而,伽达默尔认为,当解释学实践涉及规范文本(normative Texte)——如圣经、法律文本或文学典范,单纯解释技艺就不能胜任,因为解释涉及神学信仰、法律理想、文学典范性等问题,这就超出了将解释学作为一种技艺之学的看法。“它不仅是纯粹的有一种技术的学问,它更是实践哲学的近邻。它分有对实践哲学而言本质性的自我关涉(reference to self)。”^③正如实践哲学不是抽象的理论认识,而是要对学习者的生活实践发挥作用,因而具有自我关涉性。解释学不仅要克服时间距离造成的文本陌生化,理解文本说了些什么,更重要的是将我们和文本所属的传统联系起来,让文本对我们说话,使文本对我们有意义和价值。解释学的任务毋宁是占有旧的传统,使

① GW, Bd. 2, S. 317.

② Ibid., S. 500.

③ Hans-George Gadamer, *Reason in the Age of Science*, p. 97.

作者的说法重新回到生活中。

伽达默尔发展的哲学解释学之所以不同于传统的解释学，就在于他强调我们理解的真理性，这种真理性不是指客观地还原文本的原意，而是指理解内容对于理解者的现实意义。为此他认为应用问题是解释学的核心问题。传统解释学将解释学过程分为理解和解释，新教解释学代表人物兰巴赫加进了第三个因素“应用”。一般认为，在理解出现麻烦和阻碍时就需要解释（比如遇到疑难字句或缺少相关的背景知识），所以解释是在偶然情况下出现的。在浪漫派解释学施莱尔马赫那里，理解具有普遍性，哪里有理解哪里就需要解释，理解从不是直接的，而总是要通过解释，理解和解释不可分。应用是随后出现的，不属于解释学的范围。伽达默尔则进一步强调整理解、解释、应用的三统一。他认为解释者本身具有历史所规定的处境和前见。人的理解和解释总是相关于这种具体的处境和前见，因而总是包含着应用因素，即使应用不是解释者有意识的目的。“应用不是理解现象的一个随后的和偶然的成分，而是从一开始就整个地规定了理解活动。”^①

应用问题可以说是联系解释学和实践哲学的纽带。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借用亚里士多德对实践智慧和道德知识的阐述来分析理解的应用结构。正如实践者要把道德知识运用到具体的情况中，从而涉及对道德知识的重新解释，解释者要把流传的文本应用于自身的解释学处境，发现它对我们呈现出来的意义。正如道德知识不能与人的伦理存在相脱离，并且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把它实现出来，理解只有在解释者的解释学视域中才能发生，因而受到解释者前见的规定。这两类应用都不是将预先给出的普遍东西毫无改变地重现于具体情况，而是要回应具体情况的要求，体现了普遍和特殊相互规定的关系，“应用不是还原性的（reductive），而是创造性的，因为它不是单向度的”^②。由于解释学具有普遍性，理解的结构也可运用于实践过程。实践过程本身就渗透着解释学的要素，因而也是一个实践的理解过程。对于实践知识就如同对流传物一样要求理解、解释和应用这三要素的内在统一。在应用中普遍的实践知识要回应具体情况的要求，通过重新解释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洞见，这就需要实践智慧，“实践智慧并不存在于它的应用之前，而只是在应用里或从应用出发去认识”^③。

① GW, Bd. 1, S. 329.

② Joel C. Weinsheimer, *Gadamer's Hermeneu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92.

③ 让·格朗丹：《诠释学真理？——论伽达默尔的真理事概念》，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46页。

无论实践哲学还是解释学，都是以人的生活世界为基础的。在理解经验中起作用的是人的历史性的实践活动，理解的历史性因而被伽达默尔提升为解释学的基本原则。他的解释学的基本观念，如解释学循环、解释学处境、前见、视域融合、应用等，都是突出了理解活动与实践的生活世界的关联。伽达默尔认为，理解如同行动一样，从来都不是简单地应用规则，而是自由的活动，具有一定的冒险性。成功的理解意味着我们自己获得了新的经验，我们的内在意识得以增长。理解总是具有指导兴趣和问题意识的，其确定性程度不如自然科学，但它以自己的方式拓展人的视野、经验和自我认识。正如实践哲学不是要制定实践的方法和规则，而是对实践生活的阐明，哲学解释学也不是一种关于解释的程序和技术的学说，不是去规定人们应该怎样去进行理解，而是描述正确理解是怎么样的，反思它的可能性条件。当然，这种反思在非技术的意义上也能对我们的正确理解产生范导作用。哲学解释学像实践哲学一样，承认自己的条件性，同时对未来保持着开放。哲学解释学不赞同现代科学的客观性理想，而是赞同实践哲学的“参与”理想，它要求理解者和理解对象有一种先行关系，并通过理解对象来扩展和深化自我理解。哲学解释学为精神科学研究奠定了存在论基础，将其从科学的客观主义模式中解放出来，实践哲学传统对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对于实践哲学和解释学理论特征的相似性，伽达默尔说：“实践哲学是哲学，这就是说，它是一种反思，并且是对‘人类生活形式必须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反思。在同样的意义上可以说哲学解释学也并非理解的艺术，而是理解艺术的理论。但这种唤起意识的形式（Form von Bewußtmachung）都来自实践，离开了实践就将是纯粹的虚无。”^① 实践哲学和哲学解释学都基于人类的实践，它们不过是“唤起意识的形式”。它们的最终任务是反思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生活世界，使我们达到一种自觉，深化我们的自我理解。因而，伽达默尔说：“实践哲学的伟大传统继续存活在一种认识到它的哲学内涵的解释学当中。”^② 这种致力于理解人类实践生活的哲学解释学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实践哲学。

三、对实践合理性的反思

伽达默尔对实践的思考虽然深受古典实践哲学的影响，但他立足的是当代生

① GW, Bd. 2, S. 23.

② Hans-George Gadamer, *Reason in the Age of Science*, p. 111.

活,针对的是当代的实践问题。毕竟古代和今天的实践处境和对实践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古代的理论(theoria)是对世界秩序的静观,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在现代,实证科学成为理论的典范,实践成了科学的应用,这种实践概念与古代的制作和技艺更接近。在古代,实践知识高于技艺知识,一切技艺最终都是为实践服务的;而在现代,随着传统实践概念(praxis)的消亡,实践变成科学的技术应用,实践知识和实践合理性越来越被技术知识和技术合理性所取代。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就是要在现代科学主义潮流中对实践合理性重新反思。

伽达默尔对科学技术的认识来源于海德格尔。海德格尔认为,现代科学的发展受到技术本质的指引,它用数学的方法将自然作为可计算的、确定的东西呈现出来,这使得科学的技术应用得以可能。因此科学并非揭示事物本身的“客观的”认识,而是植根于主体形而上学中。科学认识的存在论前提是从主体出发将存在者的存在样式理解为现成在手(Vorhandenheit),因而可以去把握、计算、支配存在者。这种现成在手东西的存在论又可以追溯到希腊的形而上学,现代科学继承了这种存在论遗产。当前时代就是一个由技术支配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文明就是源于西方的科学—技术—工业文明。当代人从属于技术,不仅用技术的方式支配自然,而且屈从于由技术建构起来的劳动和政治组织。这就造成了人类精神萎缩成计算性智能,导致虚无主义流行。

伽达默尔继承了海德格尔对科学技术本质的思考,并且批判由科学技术理性的统治所造成的普遍异化状态。他认为,自伽利略以来的现代科学是以方法作为进步的基础,它通过抽象使人们能以数学的精确性描述自然,把握事物之间的抽象关系,因而设定一些条件就能产生可预见的结果。现代科学中隐含着“构造”(construction)观念,它使得现代技术得以可能,也使得人类控制、干预自然成为可能。如果说古代的技艺还是模仿自然提供的模型,那么现代的技术则使人按照某种想法人为地构造自然。将科学方法论构造和技术生产联系在一起,就形成了现代社会文明模式。现代社会中的人生活在人工的环境中,人为制造的东西设定了其生活条件。人和世界关系的灵活性丧失了,人把自己托付给技术的作用,以放弃自己活动能力的自由为代价,享有技术带给我们的舒适条件、商品和财富。

不仅自然环境技术化,我们的社会环境也被技术化,伽达默尔指出:“20世纪是第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得以重新被确定的时代,并且开始使技术知识从掌握自然力量扩展到掌握社会生活。”^① 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趋向于合理化,有意的

^① Hans-George Gadamer, *Reason in the Age of Science*, p. 72.

计划被用于实现社会目标。在技术统治社会中每个人都是机器上的零件,发挥特定的功能作用,而各种专家代替人们作出决定。技术社会带来一种服从倾向,适应能力要比创造能力更受奖赏。我们的生活环境的技术化被视为合理化、去魅的过程,这似乎是现代文明成熟的标志,但实际上隐含着很多的危机,如不断扩大技术活动的范围造成人的自由和创造性的丧失,信息技术造成对人脑的舆论操纵,技术化管理导致人与人的疏远和孤独,经济和技术过度发展造成威胁全人类的生态危机,等等。

科学及其技术应用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导致科学主义盛行,科学认识方式被赋予了特权,被看作唯一正确的通向世界的方式。20世纪德国哲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破除科学之客观性的假象,揭示在这种客观性下主体的前见、动机或兴趣,由此表明科学不过是人看待世界或与世界打交道的一种方式而已,不能把它绝对化,而当作唯一的知识标准。伽达默尔认为,科学有其自身的前提和动机,但其本身认识不到这一点。以科学为唯一正确的认识就会遮蔽人们对世界的其他提问方式,因此也遮盖了其他通向世界的方式,如宗教、艺术、哲学。为了正确认识科学的意义和地位,防止科学的异化及给人类带来生存危机,解释学要反思科学所要回答的问题及动机,将科学经验加入普遍的生活经验,即本源的世界经验中。“解释学反思行使一种对思维着的意识的自我批判,它把其所有的抽象观念和科学知识都重新置于人类世界经验的整体中。”^①伽达默尔的思想显然受到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的影响——将理论世界植根于生活世界中,他认为,生活世界包含着以语言为中介的世界经验,科学经验和理论是对它的抽象化。解释学维度的普遍性就体现在本源性的世界经验层面上。

虽然科学的方法抽象使得科学的技术应用成为可能,但科学不能控制这种技术应用的目的。科学及其技术应用使我们具备了巨大的制造能力,它在给人类带来方便、舒适、利益的同时,也给人类的生存造成威胁。我们无法阻止技术的发展,现代文明的成就就建立在它之上,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技术合理性的限度,要用实践合理性对其进行调节。如果任由实践堕落为技术活动,整个社会就处于非理性状态。实践合理性应涵盖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知识和能力的正确运用都要求实践合理性的指导,实践合理性要为科学的求知欲及其技术应用划定界限。伽达默尔对于现代技术文明的批判,主旨就是要区别科学技术理性和实践合理性,使科学技术理

^① GW, Bd. 2, S. 183.

性隶属于实践合理性，为人类追求良善的生活服务。这也是古代实践哲学对当代的启示。

什么是实践合理性，实践合理性的特点是什么，这正是伽达默尔要反思的。亚里士多德用“实践智慧”概念表达了这种合理性，实际上，“合理性一直处于伽达默尔试图揭示和复活的实践哲学传统的核心”^①。要正确认识实践合理性就要恢复古代对实践的理解。伽达默尔认为，我们应该从人的自由本质出发去理解实践。人虽然也有本能的一面，但是相比起动物来，这种本能是退化的。人的实践具有长远的思考、有见识的选择、服从公众目的、遵守社会行为规范等特征。这表明人的实践具有社会性，它超出了生命保存的需要，而不能仅仅从适应环境、自我保存来理解实践。人类活动既有功利性的一面，但也有超越功利的领域，这就是被希腊人称为美好(kalon)的领域，如艺术、游戏、哲学、德性等，这种领域是被所有人分享的自由领域。“说到底，这就是理性概念的诞生：合意的东西在一种对所有人来说有说服力的方式中对所有人展示越多，有关的那些人越能发现他们彼此处在此种共同的现实中；并且在这个范围内，人类拥有积极意义上的自由，他们在那个共同的现实中有他们真正的认同。”^②

在对实践合理性的认识上，伽达默尔突出了理性精神和自由精神的统一，而人的理性和自由都与人的社会性存在密不可分。亚里士多德对人有两个著名定义，即“人是理性的动物”和“人是政治的动物”，这两个规定是统一的，并且构成了伽达默尔思考人类实践的基本立足点。在他那里，理性是社会性的，合理的实践所涉及的东西应对所有人都是可接受的，因而合乎共同利益和规则。自由也是社会的自由，是在社会生活中获得认同的积极的自由，虽然这种自由在当代正受到技术统治的威胁。

因此，实践合理性与人类的共同性(Gemeinsamkeit)相关。伽达默尔在解释学中强调理解过程从根本上是一种交往过程，是特定的经验(或文本)和我们不断熟悉的过程。解释学的本质核心就通过语言的理解与陌生的东西建立起共同性。共同性概念在实践领域中就表现为团结(Solidarität)。团结是我们能够共同生活并遵循共同规则的前提条件，因而也是实践合理性的基础。“实践是在团结中处世和行

① 理查德·J. 伯恩斯坦：《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郭小平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51页。

② Hans-George Gadamer, *Reason in the Age of Science*, p. 77.

动。而团结是一切社会理性的决定性条件和基础。”^①正是强调共同性和团结并将之作为实践合理性的基础，伽达默尔诉诸古代的伦理(ethos)概念，“这种‘伦理’并不是纯粹的训练或适应，它和不顾善恶的随大流毫不相干，它是通过‘phronesis’亦即负责的合理性而得以保证的——只是在人们具有这种合理性的地方”^②。伽达默尔所说的伦理不是等级制的、压迫性的伦理，不是抹杀人的个性和自由的伦理，而是在彼此交流共同中形成共同的习俗和信念，它是需要人不断重新建立和维护的。“习俗(Konvention)是指达成一致以及达成一致的作用，并不是指纯粹外部规定的规则体系的表现，而是指个体意识与在他人意识中表现的信念之间的同一性，从而也就是与人们创造的生活秩序的同一性。”^③伽达默尔所谓的伦理和习俗是人的共同性的体现，它不是纯粹既定的东西，而是包含了人的理性和选择。我们总是和他人交流，并构成一个共同的习俗世界，在这里存在着不同于技术—实用理性的实践合理性。

伽达默尔强调实践合理性与伦理的统一，因而实践合理性是一种交往理性，它不是超验的、在每个人头脑中固有的东西，而是植根于人们共同的生活世界中，是在交往实践中形成的。在伽达默尔看来，现代技术社会改变了共同的伦理习俗，产生了专家政治和对生活世界的技术筹划，这造成人与人相互隔绝、孤立的状态，阻碍了人们共同意识的形成。因此面对着科学技术力量的日益增长及其产生的危险，重新唤醒和加强人类的团结尤为重要。“人类真正的生活问题是：能否成功地将人类能力的增长与合理的目的联系起来，并将其纳入某种合理的生活秩序中。这绝不会通过纯粹的人类能力的增长而实现，而只能通过洞见和在人们中不断增长的团结。”^④

韦伯研究了现代社会的合理化进程，他提出的现代社会的合理性是一种目的合理性，即根据既定的目的寻找最合适的手段。这种合理性实际上是技术合理性。在伽达默尔看来，实践合理性不仅为既定目标使用正确手段，更重要的是设定目标。实践哲学是以参与为前提，就是要求我们参与社会生活中，接受其合理性理想，发现隐含着的共同目标。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种共同目标越来越包含人类整体。另一方面，实践包含着选择和决定，是对目标的具体化。善的目标、普遍的东西只有通过个别东西才获得其规定性。“作为正当的东西，我们在判断中对我们自身或

① Hans-George Gadamer, *Reason in the Age of Science*, p. 87.

② *GW*, Bd. 2, S. 325.

③ *Ibid.*, S. 326.

④ *GW*, Bd. 7, S. 395.

对他人表示肯定或指责的东西来自我们关于什么是善和正当的普遍表象，但它们首先在具体的现实情况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规定性。”^① 实践理性不同于聪明机智之处在于：后者是技术性的，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只要这种手段最有效地达成目的；而对于实践理性来说，普遍的善的目的必须在具体行动中才能实现自身，不能为了目的的不择手段，这样的行为才是合乎德性的“美好”的行为。

解释学面临的应用问题就是把一般和个别结合起来，这也是实践哲学的核心任务。“解释学作为应用理论，亦即将一般和个别联系起来的理论，实际上成为了哲学的核心任务。它不仅要在一般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的知识之间进行中介，而且也必须弄清楚我们使用我们的能力所追求的诸目的，是否符合支撑着我们自己的文化和整个人类文化的共同目的。因此解释学不仅在科学中，而且在人类理解的整个领域都占主导地位。”^② 解释学作为普遍的解释哲学，反思人们对于共同的善以及对它的应用——这种应用伴随着理解和解释。在这个意义上解释学具有普遍的实践意义。

四、哲学解释学对当代实践的启示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将理解和解释作为人的生存方式，它们贯穿于我们的实践活动中。伽达默尔终其一生都在研究实践哲学传统，实践哲学和解释学在他那里一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伽达默尔所提出的一些解释学观念本身就具有实践哲学内涵，或者说就是从实践哲学中引申出来的。

伽达默尔早年通过对柏拉图的研究认识到，善的知识高于专家的知识，那些拥有专门知识的人对于善其实是无知的。这启发了他反思当代社会的技术统治和专家政治，追求真正的实践合理性和人类的良善生活。柏拉图的对话体现了探讨真理的理性形式，也反映了希腊政治生活中自由对话的共同体理想。他终身以柏拉图的学生自居，主张发展以自由平等的交谈为核心的实践合理性，反对权力和技术的操纵。可以说，“伽达默尔把出现在柏拉图那里的实践合理性的对话式特征融入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知识构想……由此阐明了与技术形成鲜明对照的另一种知识方式”^③。

① *GW*, Bd. 4, S. 184.

② Hans-George Gadamer, *Praise of Theory*, Chris Dawson (tran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61.

③ 乌多·蒂茨：《伽达默尔》，朱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6—137页。

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启发，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强调通过对话方式达到相互理解和一致，并将其作为获得超越科学方法论的真理的途径。对话理想被置于解释学的核心，他描述的解释学经验就是一种对话经验。在对话中保持开放，克服偏见，实现视域融合，从而达到对事情本身的理解。这种解释学经验也蕴含着实践的要求。在实践中对话者要能对他人保持开放的态度，愿意倾听他者的声音，从他人那里学习某些东西，并且能够质疑和修正自己固有的观点。对话是我们理解他者的途径。“理解意味着，我能够公平地权衡和考虑他人所想的東西。这意味着一个人承认其他人在其所说的或实际想说的东西中可能是正确的。”^①“他人可能是正确的”这种意识是我们实现真正对话和理解的前提。对话的目的是探讨真理，在平等自由的对话过程中提出问题，相互辩驳，克服偏见，达成共识，真理就显现出来，“不通过谈话、回答和由此获得的相互理解的共同性，我们就不能说出真理”^②。对话过程也包含说服别人，但这种说服要以追求真理为目的，不能为了利益或好胜而颠倒黑白，进行诡辩。无论是理解和说服，都需要人们具有善良意志而非权力意志，需要人们有友爱精神，以及对他人之他性的尊重。正是通过对话建立起人们之间的共同性才能实现实践合理性。

解释学首先面对着对古代流传物的解释问题，因而涉及现代人与传统的关系问题。解释学的对话理想也可运用到这一关系中。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为传统正名，反对启蒙运动以理性的名义质疑一切传统，将传统作为落后、压迫、不合理的東西。他认为，我们不能从超历史的立场去看待理性，理性植根于我们的历史性存在中。传统和理性并非绝对对立的，传统中包含着前人的智慧，具有合理性的方面。同时，他也强调传统不是僵化的、惰性的东西，而是在发展变化中才能存在，它既保存合理的東西，也有对不合理東西的改变。这里，他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合理性思想。“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尽管在历史的一切变迁中它一直是积极活动的。但是，保存是一种理性活动，当然也是这样一种难以觉察的不显眼的理性活动。”^③伽达默尔并不主张盲目地服从传统，而是通过与传统的对话发扬传统中合理性的因素，特别是体现出对现代科学理性的批判方面。比如他发现在各大文明传统中都存在某些价值态度，抵制着现代工业文明的不良倾向，如无止境地追求利润、对自然

① Hans-George Gadamer, *The Gadamer Reader: A Bouquet of the Later Writings*, Richard E. Palmer (ed.),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17.

② *GW*, Bd. 2, S. 56.

③ *GW*, Bd. 1, S. 286.

掠夺等，它们包含了对自然的敬畏，对朴素生活的欣赏，享受幸福和闲暇等。传统中包含着丰富的对人的认识和生活智慧。在一个科学技术时代，我们应该将科学知识和传统的人文知识结合起来，获得新的自我理解，克服科学技术对人的异化。

当前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和技术发展使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同时世界上也存在反全球化的力量和趋势，如经济保守主义、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产生了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等，这些现象都体现出排他性。伽达默尔虽然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后者的实践哲学局限于城邦生活，并且也具有那个时代的偏见，如对妇女和奴隶的看法），但他立足于当代生活，具有世界主义的视野。他强调世界已经成为一个整体，我们不可能再分离，因此我们需要具备世界眼光和人性意识去思考和解决所面临的危险。他说：“我确信，我们今天无论在民族国家框架内思考还是在欧洲的框架内思考都已经过时了。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分离已经不再可能。人类今天像过去一样坐在一条小船上，我们必须驾驶这条船以使我们不会一起撞到岩石上。”^①他呼唤的团结精神涉及全人类，而这种团结随着全球化和跨文化交流会日益增长，他对此持乐观态度。他的解释学为文明之间的对话奠定了哲学基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需要不同文明在平等、相互尊重和承认的基础上展开对话，相互理解，求同存异，形成一种全球的价值共识，促进合乎共同利益的实践行动。当然，伽达默尔也看到，在全球化中，西方文化具有强势地位，这特别体现为源于希腊的科学理性的普遍化。我们可以发现在非西方世界，数学化、形式化的思维也逐渐占有统治地位，在某些生活领域甚至出现了文化的标准化，比如西装作为办公室的标准着装。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要反对全球化，反对技术理性、工具理性——这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唯一的途径是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实践合理性，将技术力量纳入合理的世界秩序中，确保它有利于而不是破坏人的自由和幸福。我们要在科学的确定性理想和实践的恰当性之间达到某种平衡，为此，伽达默尔不仅强调要像黑格尔那样将现代科学成就和西方传统宗教、形而上学的洞见统一起来，而且要向其他文化学习不同于西方科学理性传统的对人类命运的洞见。

伽达默尔的对话解释学隐含着平等、自由、开放、宽容等价值取向，它们不仅在解释学经验中起作用，而且具有伦理学内涵，构成实践合理性的条件。这些价值

^① Hans-George Gadamer, *Gadamer in Conversation: Reflections and Commentary*, Richard E. Palmer (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 81.

正是现代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同时伽达默尔又强调伦理习俗、共同性、团结、友爱、传统等因素,因而其思想又具有社群主义的某些特点。伽达默尔实际上是将两方面进行某种综合。这种立场深受黑格尔的影响,而且也比较符合德国思想传统。但是现代自由主义的个人自由和平等的价值始终是基础性的。他并不主张盲目地服从共同体和传统,更不赞同压迫性的等级制、家长制或政治上的专制。他的对话哲学的前提是彼此承认对方的平等和自由,最终结果是要求同存异。他赞同黑格尔的看法,最终的理性原则是所有人的自由。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把历史解释为自由原则的发展过程,从一个人的自由到少数人的自由,再到所有人的自由。伽达默尔也认为,历史发展到今天,“自由的原理是无可怀疑和不可改变的。没有人能够肯定人类的不自由。所有人都是自由的原理绝不可能再动摇了”^①。但历史并没有终结,将这一原理实现出来仍需要长期的历史过程,而且绝不是一帆风顺的。

虽然坚持普遍的自由原理,但伽达默尔并没有像康德或哈贝马斯那样提出某种普遍主义伦理学。在他看来,只有通过具体化,普遍的应然的东西才具有确定的内容。解释学强调将普遍和特殊调和起来,普遍的东西不能脱离具体处境。因此现代的核心价值如何应用于不同的文化中就非常关键,这也涉及对它们的解释。应用自由、人权、平等、宽容等规范原理,不能像应用技术那样简单直接,也没有固定的模式,而总是要考虑到不同文化的特殊性和现实情况的复杂性,要将这些价值与具体环境的要求结合起来,使这些价值具有具体的内容。这恰恰是合乎实践理性的。现代普遍价值原理对于特殊环境的创造性适应需要实践者——尤其是政治家——具有很高的实践智慧。可以说,伽达默尔在坚持普遍原理的条件下是赞同多元化的,但并不走向没有共同性的多元主义。他的解释学所强调的普遍和特殊相中介,使得他超越了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二元对立,而这在实践上也有积极意义,既反对文化霸权,也反对混乱的多元主义。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为一种真正的全球伦理奠定了基础”^②。

五、结语

总体来看,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源于他对古代实践哲学传统的研究,这种学术

① Hans-George Gadamer, *Reason in the Age of Science*, p. 37.

② Gary B. Madison, “Gadamer’s Legacy”, in *Symposium: Canadian Journal of Continental Philosophy*, Vol. 6, Issue 2, 2002, p. 142.

性研究成果在他的著作集中占有很大比例,但同时他又站在现代生活的语境中去阐发它的价值和意义。特别是在《真理与方法》发表后,与哈贝马斯等人的论争更促进了他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他力图将实践哲学和解释学思想融合起来,形成比较有特色的解释学的实践哲学。这种实践哲学既植根于西方悠久的实践哲学传统,又有鲜明的时代意识,本身就是一种解释学实践的产物,其主旨是技术批判,弘扬实践合理性。在这方面他也继承和发展了海德格尔的思想。

伽达默尔像亚里士多德一样,始终将人的实践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就此而言他的实践哲学比现代学科划分中的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要更高一个层次,后者只是就实践的某个领域或方面进行研究。实践哲学要恢复哲学本身内在的对整体性的追求,这样的实践哲学就是一门实践的人学。因而我们可以看到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始终站在哲学的高度探讨人的存在,反思现代性命运,其中也包含了对历史性、语言、启蒙、传统、精神科学认识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探讨。虽然它涉及的内容很丰富,但又不成体系,大多是在一些文章中针对某些问题进行阐发,许多看法只是启示性的,也缺少对现实的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具体分析,这为我们进一步发展它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责任编辑:韦海波)

Abstracts and Key Words

- Hermeneutics as Practical Philosophy: On Gadamer's Practical Philosophy SHAO Hua

Abstract: Gadamer's hermeneutical thought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practical philosophy. Influenced by the tradition of ancient practical philosophy, he emphasized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actical philosophy and practice, which determin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actical philosophy different from theoretical philosophy and production philosophy. This relationship inspired his view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ermeneutics, replacing the objective ideal of science with the ideal of participation. He tried to integrate practical philosophy and hermeneutics to form a practical philosophy of hermeneutics. This practical philosophy is based on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situation, reflecting on the practical rationalit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and criticizing the crisis caused by the rule of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His hermeneutical dialogue ideal has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for contemporary practical issues, such as how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coexisting and how to treat the relationship with traditions and so on.

Key words: practice; practical rationality; hermeneutics; dialogue

- A Phenomen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Hermeneutics and Critique of Ethics YAN Hui

Abstract: The phenomen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hermeneutics is aimed at showing the original occurrence of interpretation, and the reasons why the interpreter has the will and ability to explain and prove texts that are "no more being" and actions that are "into being"; and the ethical critique of interpretation questions the legitimacy basis of interpretive behavior and the valid motivation of interpreting textual behavior. The interpreting purpose of the texts that are "no more being" is to create new meanings based on the original and intermediary meanings, the consequence of which is that it is only valid for the interpreter and does not affect or determine others' thinking and actions. As to the actions that are "into being", there are two kinds of interpretations: participator interpretation and spectator interpretation, the former aims to defend and prove, and the latter aims to reflect and criticize. In essence, the spectator interpretation is already making up public opinion, a pursuit of public good, which reflects and criticizes the "obviously unjust" behaviors that deviate or deconstruct the public good. To realize the shift from technical hermeneutics to practical hermeneutics is not only a theoretical goal, but also a strong appeal for value.

Key words: interpretation, technical hermeneutics, practical hermeneutics, modernity, justice, public good

- Hermeneutic Thinking on Subject, Speech and Situation: Starting from the Situation of Rationality and Virtue as Concepts WU Yan

Abstract: Hermeneutic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ocial science and reality research. The interpretation of rationality and virtue as the conceptual situation not only concerns the rationality and legitimacy of the subject and subjectivity, but also relieves the "pain of existence" that modern technology society is facing or will face in the creation of its speech act as the situation. Whether the rationality or virtue of the subject as the situation of the concept expresses the state of its existence, people are immersed in language, live in speech acts, and exist in situations. Among them, private language weaves the web of life in the way of speech act, and its most important feature is signifier. The subject is dissimilated, lost and sublimated in the rupture, link and resolution of signifier, in which reason plays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the form of instrumental reason, emotional reason and intuitive reason. In the private language domain, "virtue" can only be the existence of the situation constructed by the speech act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the intuitive reason has sufficient possession of the subject.